

金融运行要以增进百姓福祉为方向

□ 瑞长安

刚刚闭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表明中国特色现代金融是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事业，是引导稳定社会预期的事业，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事业。强调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就是要把金融工作向实体经济稳定运行聚焦，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以经济稳增长增进百姓长期福祉。

第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补短板，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稳定和扩大

就业。

会议指出，要“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路，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各国都在高科技开发应用上展开竞争，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将金融资源向创新、绿色、区域协调方向倾斜，鼓励金融机构切实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目的是推动市场创新力量不断释放活力、发挥创造力，增强实体经济的韧性，稳定和扩大就业。将金融资源向经济增长的主攻方向倾斜，我国经济运行才能更有后劲，更

有国际竞争力。为此，要通过完善金融机构治理，创新产品和服务，增强金融体系支持创新发展的能力。

第二，金融机构要将市场化竞争与“金融为民”理念统一起来，创造性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会议要求“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我国各类金融机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员，既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竞争，实现机构自身稳健运营和持续发展，也要遵循“金融为民”原

则，以普惠金融服务千行百业。

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保险公司，无论是证券公司还是基金公司，无论是大型机构还是中小机构，本质上都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要坚持公平定价、合理收费，不能搞“垄断吃天下”。在加强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的大命题下，要完善监管，加强引导，防止金融机构自身制造风险，要依法打击各种形式的违法违规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具有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促进市场公平的功能，要进一步发挥其平衡作用。

第三，要进一步完善优化金融市场体系，以金融市场稳定运行促进民生改善。会议要求“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

环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这些要求体现了很强的民生导向。

金融稳定不仅意味着市场波动小，还意味着投资者、金融消费者安全感强。利率、汇率基本稳定和有序波动，资本市场定价机制透明高效，房地产市场良性运行，都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为此，要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计于市场，优化制度体系和政策措施，以深化改革实现结构优化调整，以完善监管促进市场稳健运行。

上海书城重装亮相 实体书店仍需直面挑战

□ 杨鑫宇

2021年，陪伴上海市民23载的上海书城福州路店暂别读者、关门谢客，开始了为期近两年的升级改造。今年10月28日，经过重装翻新，这家被爱书之人寄托了许多别样情感的大型书店正式回归。当人们看到这座用书本搭建起的“水晶宫”再度点亮灯火时，“大书城”的记忆与情怀瞬间在读者心中重燃。

虽然在精神意义上，它依然是人们熟悉的那家书店。但是，从外观陈设到经营思路，上海书城无疑经历了一场由内而外、脱胎换骨的蝶变。近年来，在电商折扣与数字阅读的浪潮中，实体书店如同一片面积逐渐缩小的绿洲，艰难地寻求生机。上海书城重装亮相，仿佛给实体书店的复兴吹响了一声号角，但必须承认，尽管重新起航，它依然面对风浪挑战。

作为上海第一家超大型综合性零售书店，上海书城既有情怀加成，也有深厚的“家底”和“后盾”，但即便是上海书城这样的“文化明星”，也不可能一直享受舆论光环的加成，迟早要在常态化经营中接受市场考验。其他规模更小、生存压力更大的实体书店，更是不必多言。

回望上海书城“闭关”这两年，多家在圈内小有名气的独立书店遗憾落幕，多家主打商业运营与品牌建设的连锁书店经营状况也不理想。面对这些冲击，不少爱书之人深感遗憾。但对大多数普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而言，对书店的情怀再深，也不足以填补实体书店和网络购书平台之间的价格鸿沟。而很多人阅读习惯的改变，也让实体书店本身的价值遭受“屏读时代”的挑战。

实体书店的经营者，正在一个不同以往的复杂市场环境谋求生存。考虑到店

(上接1版)

作为连续参展5届进博会的“一带一路”中小企业，新西兰乳制品企业纽仕兰今年继续享受到通关贸易便利化政策，将带着新西兰72小时空运直送的纽仕兰4.0娟娜优质蛋白鲜牛奶，在第六届进博会上全球首发。

纽仕兰乳业亚太CEO盛文灏回忆，在首届进博会上，纽仕兰与北京物美达成了战略合作。3个月后，在宁夏一个县城的超市货架上，进博会同款牛奶已经在售。

“如果没有进博会，这个小县城的消费者可能在3年后才能享用到这款产品。从3年到3个月，进口品牌布局中国市场的效率提升了10倍。”盛文灏说，他们从中看到了“进博速度”。参加进博会以来，纽仕兰在中国不断开拓市场，实现了从名不见经传到行业龙头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外资企业对于进博会的参展态度不减，正是因为通过这扇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看到了“共享中国机遇”的无限可能。

上海海关副关长叶建日前表示，海关积极筹备办好第六届进博会相关工作，确保政策支持力度不减。一方面延续往届进博会的支持政策，比如允许展商在展后结转至特殊监管区、支持常年保税展示交易常态化等；另一方面还新增一条支持举措，即在评估确认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允许无动物植物疫情流行国家(地区)未获检疫准入的动植物产品、食品，经特准审批后入境参展。“这项措施将有助于更大范围、更多品类的展品参展，进一步扩大进博会的溢出带动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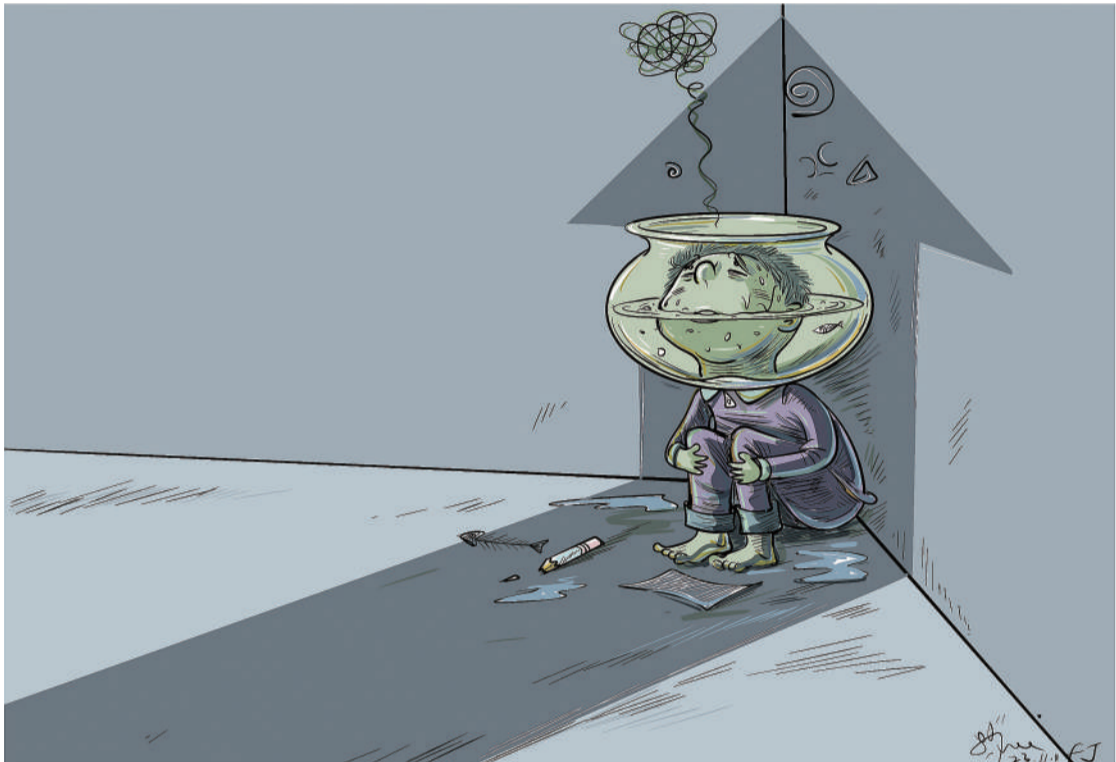
“现在不断刷新的退税速度更让我们动力加码。”上海世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去年在进博会上展出了由305颗培育钻石镶嵌而成的300克拉钻石项链，该公司董事长朱长征介绍，公司拿到的7000余万元的留抵退税款已快速到账，有效缓解了企业运营的资金压力。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发布了进博会“6+365”全生命周期服务进博机制，以“全周期驱动、个性化赋能、集成化服务”为一体的税务举措，全力支持第六届进博会办出成效。

通过该机制，在6天展会期间，税务部门将依托“助力进博会青年突击队”“服务进博多语种青年突击队”“示范区税务青年服务进博突击队”3支核心保障团队，精选业务能手入驻国家会展中心，为进博会参展商、采购商现场解答涉税疑难问题，提供全方位的税收服务保障。

“小叶子”共享开放舞台

“进博引力”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参



漫画：徐简

“外嫁女”平等安置补偿 守护了公平公正底线

□ 欧阳晨雨

农村地区“外嫁女”土地权益将得到有力保护——11月1日，最高检、全国妇联联合发布维护农村妇女涉土地合法权益行政检察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湖南省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保障“外嫁女”土地征收权益检察监督案。

之前，某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外嫁女”是否按照单独一户核算征收补偿安置款，认定标准不统一。对此，某区人民检察院向该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其后该分局制定新的《征拆安置政策和补偿认定标准》手册，对“外嫁女”制定了统一的身份认定、户型认定的补偿标准，按单独一户标准对符合规定的王某等“外嫁女”及其子女计算安置补偿费。(11月1日《中国青年报》)

就法律层面而言，农村地区的所谓“外嫁女”，理当享受平等的安置补偿。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妇

女权益保障法更是明确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令人遗憾的是，法律上的“丰满”规定，与现实补偿的“骨感”，时常形成强烈对比。在一些缺乏法治意识的农村居民看来，“外嫁女”既然嫁了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涉及家庭成员财产权益上的处分，也就不考虑她们的应得权益份额。还有一些职能部门，也在“外嫁女”问题上受到落后观念的误导，因此在政策上犯糊涂，导致“外嫁女”们没有统一的补偿认定标准，不能像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样按照单独一户标准获得安置补偿。

应当看到的是，尽管这类案例中的“外嫁女”们嫁到了外地，但漂泊在外的她们及子女，在身份、户籍上并未发生改变，法

律所赋予她们的合法权利，也不能有任何折损。面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侵权乱象，有必要采取有力举措来“纠治”，而检察建议就是一种很好的法律载体。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方式。它的定位绝不是普通的“建议”，而是以司法机关为后盾、以法律为支撑的司法手段。值得一提的是，最高检、全国妇联联合发布维护农村妇女涉土地合法权益行政检察典型案例的做法，彰显了最高司法机关的态度，明晰了维权路径，释放出保护“外嫁女”等妇女权益、促进公平正义的鲜明信号。

法治是社会转型发展的缓冲器。客观上看，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涉土地征收征用纠纷呈现增长态势，“外嫁女”等群体的合法权益时有被啃噬现象。以司法之力推动给予“外嫁女”平等安置补偿，维护了公平公正，体现了法治的进步。

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实践。一个肉眼可见的现实是，在很多大城市，托育机构越来越多，托育服务越来越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

但揆诸现实，还需直面三大难题：托育机构数量仍满足不了家庭的实际需求；托育服务的质量仍让家长心存顾虑；一些托育服务的价格让家长“吃不消”。为此，需要一一加以破解，让有需要的婴幼儿家庭能够“送得起、用得上”。

说到底，无论是健全普惠托育服务，还是加强幼儿园治理，都关乎儿童友好社会的打造。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联合23个部门发文提出，到2025年，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推动儿童友好理念深入人心，儿童友好要求在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方面充分体现。建设儿童友好社会，真正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落实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才能让他们茁壮成长。

过消费者在品牌方直播间购买的现货价格大大高于带货主播直播间预售价格的背离现象。这背后的经济常识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其实很难有真正的“最低价”——因为价格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只有“更低”，没有“最低”。而建立在“二选一”以及其他限制竞争基础上的“最低价”，更是一个伪命题。“最低价”必须得是在比较中、竞争中才能形成。所以，对消费者来说，相比某个主播和平台承诺的“最低价”，更需要的其实是更多的选择和比较。

直播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属于一种市场创新，它原本给电商市场竞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但走到今天，也确实需要处理好一些新的问题，防止它对市场活力和公平竞争造成破坏。当然，规则的完善只是一方面，在禁止签订“最低价协议”的同时，也要对它在执行中所可能所遭遇的“变通”，有积极的预防。这也更加考验监管部门在新业态中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智慧。

重奖见义勇为者 再多都不为过

□ 梁博宇

10月17日，广东珠海务工人员曾维龙途经前山南屏钢便桥时见人落水，下水施救，不幸遇难。据悉，16年前，曾维龙的大儿子在河里意外溺亡。此后多年，水性出色的曾维龙不再下河游泳。近日，珠海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确认曾维龙为见义勇为人员，共奖励110万元。

曾维龙的作为，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他的牺牲，无疑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悲剧。在这起事件的后续处理中，珠海方面的举措不仅是对相应规章制度的妥善履行，也有助于推动社会风气向上向善，形成积极的道德示范。

见义勇为，是人所共知的美德，见义勇为者往往被舆论视为“英雄”。然而近些年来，社会上时常出现“见义勇为不值”的讨论，这并不是因为公众的道德水平“退化”了，而是因为确实存在一些社会现象，让人很难不产生疑虑。过去一段时间里，公众不时能看到老人摔倒求救，路人却不敢上前，或只能先录像取证再去救助的现象。与此同时，一些见义勇为者在事后虽然获得了奖励，但其奖励可能很难弥补其付出的代价。

当见义勇为为从一种光荣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存在争议的行为，对社会道德的怀疑之风就会悄然兴起。届时，受到损害的绝不只是遇到危险而无人伸出援手的个体，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对此，社会各界还应形成合力，加大对见义勇为者的支持和奖励力度，从而弘扬正确的价值观。

这次，珠海市向跳水救人牺牲者颁发110万元奖金，数额乍看不少。但实际上，对见义勇为者怎样重奖都不为多。一方面，生命无价，再多的奖金也换不回曾维龙的生命，弥合不了家属的悲伤；另一方面，官方对一件事的价值判断是一时的，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却是深远的。重奖见义勇为者，既是对当前义举的回报，又是对类似举动的持续号召。这样的奖励越丰厚、越具体、越频繁，才越能让人们在面对“是否见义勇为”的抉择时打消疑虑，对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充满信心。

在社会风气的转变中，实践的示范比理论的宣传效果更好。尤其是在网络高度发达、信息流动极快的今天，无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都会在各种渠道的传播下迅速增幅，对社会造成影响。在本次事件中，不仅曾维龙的家属得到了重奖，在曾维龙下水前帮其保管随身物品，在找到救生圈后立即下水施救的邵立彬也按规定得到了1万元奖金，这无疑给所有人传达了充满正能量的信号：见义勇为者的善念不会被辜负，社会的公义一视同仁。受到奖励的其实不仅是见义勇为者，也是社会中每一颗向善好义的心。坚实的社会大厦离不开道德的支柱，而在弘扬道德这件事上，社会各界有理由投入更多。

如何化解年轻父母的“谁来带娃”焦虑

□ 王石川

据澎湃新闻报道，10月31日晚间，江苏太仓市浮桥镇人民政府就“幼儿园老师将小孩儿按头磕向桌子致牙齿断裂”作出通报称：“经初步调查，我镇一民办幼儿园教师王某某在10月26日的教学过程中，对一幼儿教育行为失当，导致其一颗乳牙损伤。涉事教师深刻认识其错误行为，园方与涉事教师已向家长正式道歉。”

尽管这是一起极端案例，但暴露出的问题让人深感沉重，也再次将幼儿托育难题呈现于公众面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0-3岁

婴幼儿数约3200万，其中有人托需求的家庭超过1/3，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有人托需求的家庭超2/3。一方面，托育服务需求越来越旺盛，年轻父母遭遇“谁来带娃”的难题；另一方面，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托育老师的素质良莠不齐，家长难以放心。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又如何纾解家长的焦虑？

专家指出，在孩子0-3岁阶段，来自专业机构的科学养护，具有家庭单独养护不具备的很多优点，对孩子的个体发展是有益的。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来说，把孩子送到专业机构托育，的确是比较可行的办法，但要打消家长的顾虑，要保证两点，一是托育机构足够专业，二是

托育老师足够负责。

在国新办11月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人士已表态，为进一步推进人口政策不断优化，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协调相关部门，“继续开展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创建、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评选”。除了推动在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增设婴幼儿托育服务专业，还要促进医疗机构支持托育服务发展，逐步完善托育服务的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和服务供给。

应该说，在国家的制度设计层面，托育服务已获得空前重视。早在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近年来，

谈到反垄断，反对“二选一”，想到的对象多是大的企业、平台，但其在“流量为王”的市场环境下，头部主播由于粉丝基础巨大，他们的市场竞争行为如果得不到相应规范，同样可能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带来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说，禁止主播与商家之间签订“最低价协议”，就是要尽量减少不合理行为对市场正常竞争生态造成的破坏。它无关对于主播带货行业的打压，而是基于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所作出的必要的平衡。

从消费者权益的角度看，禁止“最低价协议”也较为有利。近年来，很多人或许习惯了电商主播在直播中大喊“全网最低价”的话术。但很多时候，一些主播承诺的“最低价”可能并不靠谱。比如，之前就发生

这几年，由于电商直播带货的兴起，对于“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的治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这里面不仅涉及品牌与平台及平台与平台之间的平衡，还掺杂了主播，尤其是头部主播与平台、品牌之间的竞争关系。比如，一些头部主播凭借巨大的流量优势，拥有强大的定价权，有底气与品牌方签订“最低价协议”，甚至要求品牌方“二选一”。如此一来，带货主播的市场地位不断巩固，但也限制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在制度层面明确直播电商从业者不得要求商家签订“最低价协议”，或采取其他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协同行为，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角度，有其积极意义。

要剔除的一种认知误区是：以往我们

□ 朱昌俊

日前，由杭州市司法局发布的《直播电商产业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开始征求意见。其中一条内容引发关注：直播电商从业者不得要求商家签订“最低价协议”，或采取其他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协同行为(依法不构成垄断协议的除外)。

眼下，电商平台的“双十一”大促已经开启，与此相关的争议也多了起来。就在近期，某主播与某平台及品牌之间基于“全网最低价”协议的争议，引发了不少的关注。这一背景下，杭州拟对“最低价协议”说不的新规，显然有较强的现实性。

在发现这座城市开放和包容。“我想这次参与进博志愿服务的经历，能让我找到更多答案”。 本报上海11月2日电